

政治生态变异分析与重构逻辑

谢 平

内容提要 政治生态的变异指称政治生态随着环境变化而出现的结构失衡与意义偏差。究其主要诱因,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有待增强,基本原因在于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有待强化,直接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有待提升。从政治生态的整体性特质出发,重构政治生态,应当遵循理论、历史、现实、价值四位一体的整体性逻辑,它们分别揭示了政治生态重构的内在规律性、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和价值目的性。

关键词 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变异 分析 重构

谢 平,南京邮电大学纪委 210023

从理论旨趣角度,无论是在其首倡者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1]那里,还是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2]中,抑或在国内较早开始政治生态研究的著名学者^[3]看来,作为相对于自然生态、社会其他生态而言的一种良性政治状态,政治生态作为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政治状态的新视角,传达着人们对一种理想政治状态的现实追求。从现实问题角度,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4]，“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5]，因此，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创造性提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如果说政治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高校强化党内监督有效途径研究”(16DJB0001)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科研人员廉政风险防控管理”(2103SJA630024)阶段性成果。

[1]政治系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又成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政治生态(Political ecology)这一现代政治学术语“主要被用来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

[3]政治生态的目标在于“实现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以及政治与社会及人化自然之关系的‘绿化’”。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页。

[5]本书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

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1],那么,指称一种应然理想的政治状态,政治生态的研究旨趣的确代表了一种以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和理念解释政治现象的研究范式诉求,顺应了人类政治深入发展的客观现实诉求,体现了人们对运行有序、充满活力、治理有效的良性政治状态诉求。本文在借鉴前人和学界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立足中国语境,探寻政治生态重构逻辑,以期在学理层面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政治生态变异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生态学”研究范式就是旨在对“地方世界”中环境变迁及其生态、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进行认识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建构了“自然-社会-政治”的分析框架,赋予了生态人类学以地方经验回应全球性环境问题、参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更具普遍性议题讨论的能力^[2]。更有学者提出,生态学要求更深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的生态学”^[3]。今天考察政治生态,从实践发展看,有两个方面必须正视: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为标志,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二是党内政治生态不仅尚未实现预期要求,尚未达到“全面净化”、“风清气正”这一理想状态,而且存在着诸多变异现象。作为一个陈述性、中立性术语,变异即为变化差异。在此,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政治生态研究,指称政治生态随着环境变化而出现的结构失衡与意义偏差。变异虽然源自生物学概念,但在生物学意义上,变异是进化的条件之一,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生物界,相反也普遍存在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在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部分学者也曾借用变异来指称某种异常现象。据熊茵博士考证,信息变异虽然并不是个严谨规范的概念,但信息变异在情报学、翻译实践以及供应链管理等三个领域有所涉及^[4]。齐卫平认为,政治原生态会由于新情况新问题而出现变异现象,并提出了政治生态具有修复和创造双重特征^[5]。

立足中国语境,置身当代中国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研判政治生态的建设现状,以重视政治生态污染治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为代表的末端治理思维与政治生态问题及其治理的复杂性极不适应,在思维上有待实现现有的偏重管制的管理思维向“共同的政治信仰引导下的多主体共治”的治理思维的转向;研判政治生态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上有待实现现有的偏重政治体系、政治状态自身治理向“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全要素治理”的拓展和深化;研判政治生态的时代价值,政治生态已经日益上升为时代进步、民族复兴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政治生态在生成、形态、价值等方面发生快速变化。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政治生态存在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从政治狂热到政治冷漠、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从现实政治参与走向网络政治参与等问题^[6]。尽管学者的概括和表述多种多样,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政治生态的种种变异表现进行了十分具体的概括,对其危害也用“四个严重”指出了其重大危害性。特别是以盛行已久的潜规则、消极对抗的为官不为、依旧严重的圈子腐败为典型和代表的政治生态的

[1]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罗意:《政治生态学:当代欧美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昆明〕《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T. Benton,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1989, 178, p. 54.

[4]熊茵:《突发事件信息变异产生的社会动因分析》,〔重庆〕《新闻研究导刊》2012年第10期。

[5]齐卫平:《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净化政治生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

[6]青梅、孙会岩:《“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简讯》,〔上海〕《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诸多变异现象及其引发的诸多影响尚未明显好转,有的还呈加剧发展和演化态势,一些新的变异形态还有较为深厚的生成土壤和较大的可能性。政治生态变异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异常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正如论者指出,这些现象与党的先进性本质和纯洁性要求格格不入,虽然不代表主流,但对良好执政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危害必须引起足够反省^[1]。

二、政治生态变异的主要诱因

当我们将政治生态问题作为“中国问题”置于当下时代语境中进行讨论时,不仅政治与社会的整体建构愈发强劲,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缘由。有鉴于此,本文将侧重于诊断其主要诱因分析。

1. 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有待增强。恩格斯曾经说过:“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政治从来都不是独立和自足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特定的社会结构既是政治生态发育发展的深厚土壤和力量源泉,也是影响政治生态变异的根本性因素。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孕育出良性的政治生态。因此,政治生态的变异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而且变异本身十分复杂,但探寻政治生态变异的原因,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入手。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界限较为明晰这一特质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质,那就是政治至上和伦理本位的独特气质和形态,论证将其称之为根据权力、地位和身份建立起来的关系层级结构^[3]。这一独特的传统社会结构不仅会深深的遗留和映射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也直接的作用于现实政治生态。其次是传统政治生态的历史惯性。有学者指,一国政治生态的面貌,与其民族构成、传统文化、历史渊源等深层要素紧密相连^[4]。中国传统政治生态的独特性,表面上是政治制度的滞后和法治观念的淡漠,实质上是政治伦理的发达和先进政治文化的孱弱。这一独特性无疑会在政治生态的历史传承中保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因此,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离不开对传统政治生态的客观分析。再次是现实社会结构的不合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接续变革,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深入实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面貌,但毋庸讳言,现实社会结构依旧存在诸多有待改造和优化之处,这无疑是诸多“中国问题”包括政治问题依旧较为严峻的根本性因素。

2. 基本原因在于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有待强化。据考证,“党内的生活”提法最早出现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而“党内政治生活”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5]。有学者认为党内政治生活可以概括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党的政治制度建设活动和党的作风廉政建设活动三个方面^[6]。我们认为,党内政治生活首要的和本质的属性当然在于其政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这个新论断、新提法、新要

[1]齐卫平:《修复与创造: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净化政治生态》,〔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3]韩庆祥、汪业周:《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4]胡鞍钢、杨竺松:《中国政治生态的独特性及四大制度要素》,〔北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2月(上、下)。

[5]熊若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思想述要》,〔成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1期。

[6]吴灿新:《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生态关系研究》,〔昆明〕《桂海论丛》2017年第2期。

求。同时,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又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高度重视作风建设,这应成为严肃党的政治生活的切入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不仅将党内政治生活表述为思想建设活动等十二个方面,而且十分具体地指出了以理想信念不坚定等为代表的一些突出问题。审视现有政治生活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异表现,其根子在于理想信念为代表的政治性的淡漠。

3. 直接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有待提升。政治的属人性与为人性本质决定了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态的底色和灵魂,也是政治生态被污染和失衡的直接原因。对于政治生态而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条件和土壤就是政治文化。按照帕森斯结构功能论,文化系统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社会追求的目标,一旦文化结构与目标同社会结构或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抵触或脱节,社会就会出现失范甚至越轨行为等严重后果^[1]。建党以来,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这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但政治生态的种种变异表现最为直接的原因,都可以从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上找到答案。原因在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依旧不容乐观。首先是政治文化的西强我弱格局的长期存在,使得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容易得手。“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2]。我们否认西方政治生态蕴含的民主、法治、平等、公平等价值理念,但西方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伦理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也不同程度地对我国政治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时甚至是破坏式和颠覆性的。其次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网络社会的来临和发展使得西方政治文化的入侵更为便捷,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政治文化借助网络空间传播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不可轻视。再次是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的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庸俗甚至腐朽的封建政治文化依旧大有市场。我们党强调要以党内思想道德建设为重点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就在于此。

三、政治生态的重构逻辑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还是现代解释学的整体观;无论是强调部分之于整体价值的结构主义、重视整体之于部分价值的本质主义,还是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战略回应的整体性治理方式,整体性指称和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整体性治理的诉求是其基本治理方式。总之,立足当代中国语境,政治生态变异的表现多样,原因多元。作为政治发展的综合性范畴和整体性平台,政治生态在理论形态、历史方位、现实样态、价值承载等方面具有的系统性内在,要求我们从整体性视阈进行审视。遵循政治生态的整体性特质,我们将尝试性从理论、历史、现实、价值四个方面提出重构政治生态的整体性逻辑。

1. 理论逻辑揭示的是政治生态重构的内在规律性。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治生态的理论建构取得很大进展,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本土化理论体系远未形成。借鉴国内外现有成果,可以从逻辑起点、基本蕴含、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四个层次进行政治生态理论逻辑的把握。在学术讨论的意义上,符合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的,应当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现实存在状态上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历史起点上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和吻合性、核心概念蕴涵上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没有超越现实政治状况的

[1]刘润忠:《社会行动·社会系统·社会控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理论述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页。

[2]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纯粹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作为一种实践方式的概念蕴涵和理论形态的逻辑起点,既不能简单等同政治学和生态学的逻辑起点,也不能机械相加政治活动和生态治理两种实践方式理论形态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也只能是政治文明进程中一国政治活动的基本样态和基本方式。从概念界定看,政治生态的首倡者伊斯顿认为,政治生活是一个整体的行为系统,这一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并“处于来自于其他系统的影响之下”^[1]。按照政治生态构成要素的不同,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持三要素说的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主要包括良好的政治制度、规范的政治行为和健康的政治意识^[2];另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指政治主体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的生存方式、政治习性以及生存和发展的状态^[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主要由体制要素、文化要素和过程要素三部分构成^[4];有观点将政治生态分解为风清气正的党内生态、廉洁高效的行政生态、民主法治的社会生态^[5];著名学者刘京希认为,政治生态包括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三个层级^[6]。持四要素说的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包括制度生态、法治生态、权力生态、反腐生态^[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态包括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党内政治关系、完善的党内政治制度、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8]。基于现有研究,最为简约的理解,我们可以将政治生态理解为一种生态化的政治体系^[9]或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即生态意义上的政治体系(静态政治)或政治状态(动态政治)的现实样态、存在方式。从理论基础看,政治生态重构的理论指南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环境的理论不仅为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是政治生态重构的直接理论指南。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生态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生态政治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论、廉政生态论这样四个研究发展阶段^[10]。其实,无论是哪一个阶段,也无论怎样表述,都体现了政治生态重构的浓厚理论色彩和深刻理论逻辑。

2. 历史逻辑揭示的是政治生态重构的历史必然性。这一历史必然性强调的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构不应是机械照搬过去或者简单移植他者,也不应是主观臆造或者异想天开,而应当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并且深刻体现为顺应政治生态的内在发展逻辑、契合社会整体变迁与政治生态变革的外部互动逻辑、符合政治生态建设的战略选择逻辑。从政治生态自身的历史演进看,有论者认为中国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主政治生态修复阶段;全面、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民主政治生态曲折发展阶段;“文革”期间及文革后短暂徘徊的民主政治生态破坏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现在民主政治生态再修复阶段这样四个阶段^[11]。无论怎么概括,我们都必须明确,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历史形态的接续,特别是要深刻总结和深入提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政治生态的形态变化轨迹和发展逻辑。在中国语境的历时态意义上,按照时代特征的阶段性,对应站起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熊光清:《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上海〕《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8期。

[3]郝宇青:《“政治生态”的内涵解读》,〔上海〕《探索与争鸣》2015年11期。

[4]刘笑言、郝东明:《体制·文化·过程: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三维审视》,〔上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5]冯留建、张伟:《中共十八大以来净化政治生态的基本路径》,〔北京〕《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6][9]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第37页。

[7]方世南、孔川:《如何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南京〕《新华日报》2017年6月28日。

[8]吕岩松:《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北京〕《学习时报》2017年2月17日。

[10]李斌雄、张银霞、兰洁:《重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生态学智慧吸纳——基于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探索》,《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1]李新:《政治生态视域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政治生态至少经历了革命的政治生态、建设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的政治生态三种前后相接、不断发展的基本形态。我们既要坚守传统优势,又要善于根据时代特征的新变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构建植根新的历史方位的新形态。从政治生态历史变革的外部原因看,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是政治生态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在共时态的意义上,当下发展的政治生态是与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生态具有复杂而密切的关联和统一性。正是社会与政治的双向建构塑造了政治生态的现实样态和时代面貌,政治生态也只有与时俱进、植根社会方能生生不息。从政治生态重构的战略选择看,战略选择不仅决定发展方式,而且体现发展格局。唯有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智慧,将政治生态重构纳入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才能真正转变治理方式,促进现代转型,也才能顺应发展进入新时代国家、社会和人民对良性政治生态的诉求。

3. 现实逻辑揭示的是政治生态重构的现实合理性。“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当代中国政治生态重构的现实性,不仅在于这一安排契合理论与历史的定位,更因其准确探测和深刻把脉政治生态现实问题的本质。从微观上看,政治生态是指政治系统内生态,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政治文化、政治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统一体,这也是政治生态现实形态的集中表现。从微观上看,政治生态的重构逻辑,体现的是政治生态的本质向度,最为根本的在于要深刻把握和切实处理好政治的本质要求与实现程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认识和把握这个根本矛盾的张力中不断优化政治生态。从中观上看,政治生态的直接影响因素是社会结构,政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塑造者现实的政治生态。中观视野的政治生态的重构逻辑,体现的是政治生态的社会向度,最为根本的在于要将政治生态的重构置于现实结构及其运行的体系与实践之中,促进政治与社会的双向深度建构。从宏观上看,政治生态是基于政治-社会-自然三维架构之中的大系统。在事实层面,虽然自然对政治的影响具有间接性,但全世界范围内生态问题爆发的集中性、剧烈性与先发性为人类敲响了政治问题的警钟。

4. 价值逻辑揭示的是政治生态重构的价值目的性。政治生态重构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政治的属人性与为人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以人民为中心是政治生态重构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准绳,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权利的真实和全面实现,应当成为政治生态重构的价值旨归。践行这一价值标准,内在地要求首先要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立场,无论是政治生态的重构理念、标准,还是行动设计、安排,抑或重构能力的提升和运用,都要以此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要坚持共享政治发展成果这一重构宗旨,在通过重构政治生态促进政治先进、推进政治文明进程中,必须从满足人民多样性政治需求特别是更广泛、更深入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的现实需求出发。党和政府应该大力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主动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积极利用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2]。再次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重构模式,无论是重构理论理念、效果评价、过程监督、立法和实施体制等多维重构新体系的设计,还是各环节、各要素的综合作用,不仅要注重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注重提升重构的法治化水平,也要注重激发各阶层、各方面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形成重构合力。

〔责任编辑:天 则〕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9-290 页。

[2]刘继荣:《论公共领域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及启示》,《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